

儿童节/周末特别策划

儿童节到了,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迎来的孩子们的节日。

我们仅从孩子的节日和生活,就能读出历史发生的巨变。

在一个孩子成长的历程中,父母尤其是母亲,最关心的是学习、吃和玩。这维系着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,多少年来这三件事都成为最重要的牵挂。

而在四十年前,城市孩子的“吃”就显得更为重要,除了“购粮本”以及每月票证规定的内容,一家人在吃饱 and 吃好之间,最向往的副食,应该是一手拿钱、一手拿粮票,还要犹豫再三才能去买的点心。

如今的济宁老点心,已被数不清的食品湮没在汪洋大海了。但五十岁以上的济宁人,应该是记忆犹新的。在我们凭记忆和日常所见,列举的二十多种老点心,十几家老字号、老商铺清单上,有的老点心、老店家已消失数十年之久。比如环饼,一种微甜的、粗粝的、空心的、挺磨牙的饼。

《文化周末》在五十岁和九十岁之间的读者中,邀请了几位“老济宁”,和我们一起回忆那个石板铺路,青砖黛瓦的河畔小城街巷里,永远回味的童年芬芳……

——周末特别策划人 成岳

消失的环饼：儿时的济宁老点心你们还好吗

图文 本报记者 崔璐



芙蓉糕、长寿糕、牛舌酥、羊角蜜、炒糖、江丝、芙蓉果……这些老济宁最传统的糕点,说起来多少人会吞下口水。点心是老人、小孩以及上班族的适宜食品,曾经这些都是一年吃不到几次的美食,串门走亲戚的重礼。

岁月变迁,传统点心在今天已不再凸显,但对于很多人来说,传统糕点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食物,某种意义上,它是地方味道的痕迹,也是地方的文化符号。地处大运河中段的济宁,融汇南北,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老济宁糕点文化。

点心是一种礼节食品

“糕点是学名,济宁叫做点心。它不能大量的吃,实际上,很多糕点,就是老人和小孩吃的多,因为以前把糖作为重要营养。糕点除了作为营养品以外,还作为礼品用品,串门、祭祀都会用到点心,直到现在也是。”《文化周末》读者、土生土长的老济宁人梁方苏说。

霍家街、里塘子街,这片距离老济宁商业区很近的地方,是梁方苏小时候的生活地。在他的记忆里,这片区域附近有着很多的糕点铺。“最有名的就是兰芳斋,兰芳斋又分南兰芳和北兰芳。北兰芳是在南门大街路东,院门口对过的那个地方。兰芳斋在电影院北邻的路东。实际上,最早也不在那里,是在市立医院那个位置,就在里塘子街口,路西,四间房子大小,摆得很满。再因为距离近,小孩嘴馋,对吃的高兴,经常去看。点心的名称记得少,记形状记得多,后来大了才开始记名称。”

86岁的张振洋先生,与梁先生一样,是《文化周末》的热心读者和作者,他说点心在以前是很稀罕的东西,是好东西,不会经常能吃到。“因为点心是甜的,不管大人小孩都喜欢,但又不能吃很多,所以都很惦记着。以前的兰芳斋在济宁那是相当出名的,里面点心品种很多。”



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以前经常聊,我觉得不是纯白面,是小米面或者玉米面多一点,它出来是丝状的。济宁通称口酥,里面较好的叫桃酥。我原来的印象,我以为是形状带个尖的,像个桃,但实际上是上面撒了核桃仁,现在还有撒瓜子、芝麻的。从前还有方块的叫方酥,还有牛舌酥,现在还卖。牛舌酥和桃酥不一样,它是白面的,和酥饼、月饼外面的皮差不多,用油和成发面,包了然后烤,上面的油少,桃酥大概油多一点。”

饼类是另一大类糕点,“比较好吃的是金钱饼,上面有芝麻。其他还有各种形状的饼,都记不清名字了。还有一种比桃酥小的饼,也是种酥饼,和桃酥颜色一样,但是没那么酥。因为点心有酥的、焦的、脆的都不一样。还有芝麻饼、麻饼。”他回忆道。

芙蓉果是果类点心的代表,“大概也是南方传来的,也是江米、糯米做的,发得很大,全白的,空壳,外面粘上白糖,包上一层皮。芙蓉果以前很流行,一是好吃,比较甜;二是拿来送礼,一斤可以称很多,提着很好看。跟芙蓉果一样的,还有一种个头小一些的,金黄色的叫香酥果,它可能是一过油,外表就成金黄色的了,成分是一样的。还有炒果,实际上是炒糖的一种,比炒糖更酥。炒糖的形状短粗,颜色略深,炒果细长,跟小拇指差不多长,金黄色,也是外面糖。”梁方苏说。

在果类点心中,他还特别提到了鸡骨糖,“很多人都没见过,这个是按形状说的,像鸡骨头一样的形状,颜色也像鸡骨头,白发黄,这是外壳,里面是空心的,灌的有麦芽糖,一咬就淌出来了。卖的时候害怕会化掉,就在外面撒上一一些白色的粉,这种粉是能吃的,很多点心上都会撒。还有跟鸡骨糖差不多的羊角蜜,它是做成羊角状,里面灌馅,有人认为是灌的蜜,好的大概是蜜,实际上是麦芽糖,稀的麦芽糖。也是江米做的,外面粘上白砂糖。很多外面粘碎糖的点心都是用的白砂糖,其实要的就是口感,嚼起来很有颗粒感。其他粘糖的,像芙蓉果、炒糖外面也是白糖,熬的白糖。”

月饼是中秋节的节日食品,但在济宁人的生活中,平时也是吃的。梁方苏说,“月饼也是一大类,现在只是在中秋节卖月饼,原来平时也有,但是不叫月饼,和月饼制法完全一样,叫倬倬,也叫八件,八个一斤。有时候还做成大象棋子的样子,上面是印上‘车马相士帅……’也叫棋子饼,它应该是属于硬皮月饼,里面的馅也是各种都有。一到中秋节,这些就叫做月饼了。”

梁方苏回忆的这些都是济宁最通俗的一些点心,他还提到,类似现在卖的小酥饼的开口笑,里面带馅,豆沙、枣泥等各种馅,还有枣泥饼、枣泥卷,还有花生粘、天津豆,这些花生做的点心。在张振洋的记忆中,同样都有印象。他们还讲到了堆沙,“堆沙,大概乒乓球大小吧,圆形的,白颜色,也是糯米做的,中间略空,但不带馅,很松软。所谓堆沙就是外面用白砂糖粘得满满的,不能用绵糖。还有一个它的变种,大概叫做玫瑰球什么的,大致工艺一样,可能就是材料不一样。表皮不再是白色、黄色这些,是玫瑰色,味道也有玫瑰的味道,做得小一些,挺好吃的。”

极具特色的纸绳包装

包装也是传统点心的一大特色,传统点心是用纸绳包装的。在梁方苏的记忆里,以前的店铺里都会从屋顶吊下来一根绳,用来包扎商品。

“以前的学徒,进店里最先学的就是包装。用那种纸和绳包好,顾客一提溜就可以走了。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去买点心,那个店铺的玻璃柜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点心,孩子一般是不钱买的。有时逢年过节会很自豪的跟在大人的后面,点这点那。最佩服的就是售货员娴熟的手艺,就是纸,一般是把点心分成两摞或者四摞,放在纸的中心,留出四角,翻来转去,一张大纸整个的包裹起来。把一张小红纸盖在顶上,接着用一根纸绳缠来绕去,把包得方方正正的点心五花大绑,之后在头顶上绕两个圈,打个结,最后最精彩的时候



来了,售货员一手拽着绳结末梢,另一手迅速转两个圈,猛地一挣,纸绳完美断开,打包完成。整个过程也不过二十多秒吧。”

在《文化周末》五十岁以上读者中,大家对这种包装印象深刻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,才出现所谓的食品袋,最早也叫方便袋,果然很方便,也为环保带来无数麻烦。过去的包装,都是可回收、降解的。买生肉、油条,是系一根麻绳提着;熟肉是用荷叶包的,不用打开,就有肉的浓香和莲的清香。

而点心的包装,就是纸张和纸绳。那种纸结实、严密而透气,易折叠,拉力也强,物美价廉,古色古香。纸绳是作坊小厂制作的,盘成一团高挂在点心柜台的上方,用多长拽就可以了。济宁人称作纸经子、经子,虽然是纸做的,但很结实,小孩是嬉不断的,要用剪刀才行。而在售货员手里,他(她)们包了点心,拿这绳绑扎时,两个手指顺势一拧就断了,不苛刻也不浪费。每次买点心,除了因为好吃的东西咽口水,营业员手上的功夫绝活,也让孩子们目瞪口呆。那时候,似乎每个行业的人们,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甚至哥哥姐姐级的,工作的样子都很帅,运筹帷幄、胸有成竹、手到擒来,庖丁解牛的神奇。

提到传统老点心,多少人心头都会泛起丝丝的甜意。对于这些点心,如今的孩子也许能说出几样来。但他们和以前的孩子一样,只喜欢吃,不习惯记点心的名字。以至许多点心的名字都不知道,慢慢的知道的也忘掉了。而对于蛋糕、泡芙、榴莲酥、凤梨酥、蛋挞等新式点心,他们会更加的耳熟能详。

在过去,传统的点心是孩子们望眼欲穿的,它们代表着生活的富裕和殷实。而今它们变得低调了,除非老街巷、老社区甚至农贸市场,它们身影难觅。

一位五十多岁的读者说,他几乎每周去固定的老街购买老点心,因为习惯了那些老口味。现在想起来,也是当年特别想吃,却很少能买。如今什么食品都应有尽有,想买就买,已经不存在你期待的一种食品了。没有期待,反而是美食的一种欠缺。

和传统点心相比,新式点心比较洋气,加上大批商家一拥而上,很快就覆盖了原有的传统点心。在如今的市场上,新式点心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。中点、西点、甜点、水果点心,种类繁多,特别是很多西式糕点品类,进入市场后,巧克力蛋糕、烤芝士蛋糕、冰淇淋蛋糕、乳酪蛋糕……让人眼花缭乱。现如今,各大超市、糕点店里各式各样的中式和西式糕点琳琅满目,虽然也香气扑鼻、美味好吃,但是却缺少了那份醇厚、质朴的味道,更缺少了乡愁,不免让人怀念起传统糕点的味道和境界了。



周末下午茶

总有一位老师在每个人的脑海里

欧宜准

每个人的求学年代,总有一位老师深深地印在脑海。

我读的高中在县里最好的中学,刘老师担任高二和高三两年的数学老师,约莫四五十岁,他的女儿和我们是同届。那双特别大的眼睛要是瞪起人来,可毫不含糊,让你恨不得赶紧找个地洞钻下去。不过,刘老师也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,他毫不掩饰,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。刘老师也有个不好的癖好,那就是爱抽烟。多年来已成了习惯,不抽烟不自在,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就是被烟熏黄的,身上常有烟味儿。有时他给我们上自习的时候,实在忍不住了,便会情不自禁地从口袋里抽出一根烟来点燃。只不过班上有同学抗议,投诉信都写到校长那儿了,他也理亏;往后,要是烟瘾犯了,便在黑板上留几个题目,然后默默夹着烟走到教室外的走廊上抽。刘老师抽烟很多年了,我们也都劝他戒,他就只是笑:“这么多年的老习惯了,怎么戒得掉?”但他知道班上男生抽烟时,又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抽烟不好。

刘老师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。他的字就别具一格,说不清是什么体,细细瘦瘦的,很难认,班上的同学倒是美其名曰:老刘独创体。还有同学特意模仿。他才教我们的时候,要瞪大眼睛看半天,才分辨得出写的是什么,后来慢慢习惯了他的字。

他讲课特别容易激动,有时他提出一个难题,要是谁有了一点思路,他一定拍手叫好,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满是笑意,像个孩子得了块糖似的。讲课时到激动之处,他便手也舞足也蹈,表情特别丰富,像一出独特风格的戏剧。刘老师上课常讲一些国内外大事,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。他说理科生就该视野开阔点。

从他那里,我们收获了很多关于政治、历史的知识。有时他讲着讲着便忘了时间,下课铃声一响,他便如梦方醒地笑着拍拍脑袋:“算了,剩下的我们下节课再讲吧!”整个高三,刘老师的课堂气氛是最活跃的,他用他的刘氏幽默赶走了我们高三的沉闷。

虽然刘老师上课经常都是从天文谈到地理,从古代谈到现代,从中国谈到外国,但是他也常常激励我们勤奋学习,讲题目的时候也特别认真、特别仔细,要是班上的学习气氛不浓了,他便喃喃自语:“少时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啊!”

说起我和刘老师的渊源,还是高二的一次数学课。我和他因为一道题产生了争执,结果记不清了,但自那以后,他上课就常常喊我回答问题,所以我上数学课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。慢慢地便爱上了刘老师独特的讲课方式,也爱上了数学。但是我因为粗心也常常被他训,训的次数多了便长记性了,数学成绩也慢慢地“训”高了,后来被“训”到了省重点大学。

在那个沉闷的六月里,刘老师用他的积极乐观,用他的独特幽默,驱散了高考带来的浮躁不安,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最绚烂的一抹色彩。

当年的“两种准备”

陆琴华

1978年我读高中时,学制两年,1980年迎来了高考。头一天,在班主任还有各科老师的带领下,跟军人拉练似的,浩浩荡荡来到了一个毗邻我们中学的公社,考点就在那个公社中学。

那儿有一个大礼堂,简称万人大礼堂。这个礼堂平时不是用来召开万人大会,就是用来放电影。高考了,万人大会不开了,电影也不放了,而是腾出来让我们住在那里。

当时我所在的公社中学有四个高中毕业班,二百余人参加高考,都被学校安排在这里住。说真的,那个大礼堂一点儿不适合住宿,里面从头到尾、从左到右都是一排排早已固定好了的长凳子。好在每条长凳子之间都有二三十厘米的空档,铺张草席躺着,也还凑合。

那时高考定在每年7月的7、8、9三天,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。当时那三天热不热呢?热到什么程度呢?几十年过去了,只记得当时那个大礼堂里没有电扇,更没有空调。我们热了,就用书本当扇子来扇风取凉。

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。李一鸣是我同学,也是同桌。参加高考了,住在这大礼堂也是紧紧挨着我。他爸爸是这个公社的副主任,他跟他爸爸一样都有一颗壮志不已的心。不用说,他很想通过高考一鸣惊人。

睡到半夜,挨在我旁边睡的李一鸣推推我,说:“我们到外面凉快凉快吧。”我换了地方就睡不着觉,一点儿睡意都没有,抹了一把脸上的汗,就卷起席子蹑手蹑脚跟他出去,来到一块空地上躺着。

微风拂来,我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星,心里觉得凉快了不少,可还是没点入睡意。李一鸣说:“我提问题,你回答。”他规定答不出对方的问题,就得继续接受提问。当时我们提的问题,都是老师叫我们背的那些课文和公式。我背出一个,就提一个问题让他回答。一问一答没完没了,当然也挺有趣的。等到我们都觉得困了,那些提问和回答才告一段落。

“还不起来,都什么时候了?”我和李一鸣睁开眼一瞧,一轮红日已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,班主任站在我们面前,一脸严肃。班主任说:“点名,点过来点过去,就点不到你两人。”批评我们没有组织纪律性,没有集体主义观点。我和李一鸣慌里慌张要朝考场跑,班主任说:“不吃早餐了?”就把馒头和油条塞到我两手里。

如今考试一结束,特别是第一场结束,不少考生都不说自个考得如何,生怕答案有别会影响下一场考试。我们那时可不管这些,一出考场就互相问,对答案。即使答案跟人不一样也没关系。暗下决心,力争下一场考得好一点,把上一场的失误最大限度弥补回来。

当时我担心作文可能写跑题了,就决定利用下一场考试前,抓紧时间背公式。那个李一鸣又问我:“你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?”考不上,我还想复读,可是我没有说出口。李一鸣就说:“我要是考不上大学,就得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。”原来他母亲是农业户口,他家五六口人除了他爸爸,其余都跟我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

那时大学录取名额有限,说众人过独木桥一点儿不夸张,一所高中学校二三百名考生光头的,不是稀奇事。不过那时的我们,心态比较平和,考上大学固然光荣,就是考不上大学,回乡参加农业生产,同样为国家做贡献,用当时比较流行的话来说,就是“一颗红心,两种准备”。